

寿永明 王晓初◎主编

反思与突破:

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反思与突破:

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

FANSI YU TUPO:

ZAI JINGDIAN YU XIANSHI ZHONG ZOUXIANG ZONGSHEN DE LUXUN YANJIU

寿永明 王晓初◎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与突破: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寿永明,
王晓初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96-4188-1

I. ①反… II. ①寿… ②王…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856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34.25 字数:600千字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5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鲁迅研究的世纪反思与突破

——“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代序)

王晓初 赵京华

2011年9月25日是鲁迅一百三十周年诞辰纪念日,鲁迅研究也走过了一百年的岁月。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始终影响着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因而,如何透过百年的风雨,总结与提炼出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进而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就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鲁迅研究会与绍兴市人民政府于9月24—26日在鲁迅故里绍兴主办了“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得到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积极支持,在“鲁迅与现代中国”、“鲁迅文学经典重读”、“鲁迅的世界影响及其他”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突破。

一、鲁迅与现代中国

鲁迅是深深介入并改变了,同时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作家。竹内好说:“在鲁迅之前,虽然产生过一些先驱性的开拓者典型,但他们都孤立于历史之外。因为孤立于历史之外,他们作为开拓者未能得到历史性的评价。使这些先驱者有可能被视为开拓者,盖始于鲁迅出现以后。就是说,原因在于,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故新的人物之诞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意识上之全面更新的现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而自觉到这一点总是要在历史的一个时期过去之后。”^①鲁迅始终生存在中国现代历史之中,“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②。那么在中国现代历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之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① [日]竹内好著,李东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1页。

② 孙郁、黄乔生:《总序》,见瞿秋白等著《红色光环下的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待鲁迅?鲁迅在新世纪还有什么意义?这无疑鲁迅研究者应该首先回答的两个问题。

彭定安(辽宁省社科院)以《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为题,提出鲁迅的文学是形象化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心声与精神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并且从读者接受,到鲁迅的创作追求,再到具体文学文本加以了切实的论证。鲁迅的文学是以“醒民—救国”为特征的,同时又以超前性、寓言性深入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本质。因而,“读鲁迅,就是读中国;了解鲁迅的作品,就是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了解中国人”。他在呼应张旭东“阿Q就是中国”^①的寓言性的观点时指出:“《阿Q正传》之为一个民族寓言—民族文本,从总体上说,就是它把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意义世界、中国的人生、中国有关革命的话语和实践,统统纳入了他的小说文本的象征系统和意义系统。它的隐喻、象征、变形、反讽等等,都具有涵盖广泛和深邃的力量。”并把这种寓言性解读扩展到《狂人日记》、《风波》等作品的解读中。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思维方式的变革的角度认定,鲁迅“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张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鲁迅的文学世界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鲁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否定的媒介者”,更在于“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虽然他无力遏止现实历史中的权力的凶恶,但他能检视各类知识话语修辞背后的权力正当性,戳穿‘称为神的和成为魔的战斗’的假面具,揭露它们‘并非争夺天国,而要得地狱的统治权’。这是一种‘试毒剂’的功能。”也可以说是“鲁迅之于现代中国的毒性正义”。王吉鹏(辽宁师范大学)从反封建专制、反愚昧迷信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的当今时代中去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无论是鲁迅改良人生的社会变革精神,还是他建立“人国”、“第三样时代”的理想,都始终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叶继奋(宁波大学)则从21世纪世界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提出鲁迅经典是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资源。

对鲁迅的认识与定位,还可以把他还原到历史的脉络与语境中,从历史的逻辑演绎中看看他为什么会成为现代文化的方向。在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看来,中国现代文化生发于五四新文化。不过同样源于五四新文化,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等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五四落潮期,胡适等倡导的“好政府主义”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是想通过“专家政治”来使中国的政治逐步走上现代政治的正轨,通过“整理国故”而“再造文明”而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胡适所鼓吹的“专家政治”实际上不过是中国传统“为民做主”的变换招牌。同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始终是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质乃至法西斯主义性质的专制政权;因而他们所幻想“专家政治”始终都只是一个

① 张旭东:《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

一厢情愿的梦想。他们实际上只是起到粉饰与维护这一政权的作用。“整理国故”混淆了学术研究和青年一般的区别,虽然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保守复古的社会思潮与风气。鲁迅则以“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僵尸”,是要“行”而不是“言”,强化了青年的社会反抗精神;同时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反思了精英启蒙知识分子的贵族化倾向及其生产新的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可能,从而展开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并自觉地放逐于体制的“文人学者”、“知识阶级”之外,而投身于民间的、独立的、自由的反抗运动之中。因而,1927年他选择来到上海,一方面,对于制造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的新的、血腥的、恐怖的蒋介石专制政权给予直接的对立与抗争;另一方面,对以胡适为领袖的“新月派”文人诋毁底层民众、献媚专制政权的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揭露。不过面对启蒙的失落与困惑,语丝派的周作人与鲁迅也发生了分化。如果说,由“看客”的卑怯和“暴民”的狂热,周作人看到的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那么,鲁迅则认为是被统治者,包括“圣人和圣人之徒的道理”、千年的“古训”等,“治”的结果,是“治绩”。所以坚守“个性的文学”的周作人等从喧哗的“十字街头”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不同于周作人派文人的休闲与隐逸(论语派、京派),鲁迅则义无反顾地走向为争取底层民众的解放的反抗斗争之中。这样,将个人的解放与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民族的解放有机统一起来的鲁迅的道路,就超越了胡适等体制“帮闲”知识分子、周作人等个人隐逸知识分子的道路,而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方向,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意义家园。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从痛感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的角度阐释了鲁迅思想的“人生来源”。在他看来,“痛感”是“一种对于苦难的坦然的正视、深切的体验与纠缠中的克服与超越,是作为精神创造者的知识分子正视人生、‘穿击’人生的庄严的形式”。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是在“痛感”中创造自己的精神成果的。鲁迅正是“20世纪中国,也是千年封建历史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富有人生‘痛感’的一位”。他童年的创伤性体验使他形成了“求真”与“立人”的趋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础。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透过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发掘出一种不为人所注意的“言”与“行”背离的“我要骗人”的生存方式与话语方式,并进而分析了这一缠绕的方式所传达的鲁迅真心的“善”与“伟大的德行”,同时也指出这一方式与鲁迅所领会的阶级论观念的结合而造成的历史性误识——对前苏联的认识和赞美。其实袁文实际讨论的是鲁迅“言”(往往也与外在的“行”相关联)与(内在、不外露的)“心”的背离,而这种言不由衷的方式是与多种历史因素(包括鲁迅的多种思想因素)相关联的,是这多种因素冲突的结果。这的确构成了解读鲁迅及其所处历史的一个切口。但是,把鲁迅对于前苏联的误识归结为目的善对手段恶的遮蔽乃至认识论上“唯新至上”的推论是否符合鲁迅的思想逻辑,却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讨论。长堀佑造(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就在详细考证鲁迅晚年拒绝赴苏疗养的史实后指出:“对大搞肃清运动的斯大林的苏联及驻苏中共代表团王明一派的不信任”,是鲁迅宁去

“正在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也不去共产国际的红色首都莫斯科”的重要原因。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说:“谈到鲁迅的美学观,如果以西洋的现代文学理论附会之,会带来一些认识的困惑。”正是在直视鲁迅文学的独特存在中,孙郁提升了鲁迅的独特美学——“对生存隐秘的凝视”。“写实的理念与现代主义的感受交替其间。写实乃对生活的判断依据,而变形的艺术体验则有创造的愉悦在。所以既强调洞察力,也主张表达的超越性。”“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界限消失了”,“通往精神世界的隐秘之门打通了”,“历史的场景也是内心不安的心绪的排列”,“所有的现代作家在面对他的文本时,都发现了流行的理念中缺失的存在”。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觉,他的言语在没有逻辑的世界启程了。“人间一切秩序都是人为的涂抹,当直面现实的时候,就会发现,先前的语言曾经污染,只有非逻辑的描述,才更接近现实。”“在那些看似变形、灰暗的文字里,鲁迅呈现的是对现象界的内在性的穿射”,“在夸张、绝望和呐喊里,展示着隐藏在现象界背后的存在”。

黄健(浙江大学)指出,鲁迅强调“对立”、“冲突”、“动荡”、“变异”的“崇高”美学,既是对传统的“中庸”、“均匀”、“对称”、“稳定”、“谐和”的“中和”美学的超越,更是通过这种“对立”、“冲突”、“斗争”,达到对人的自由的一种审美张扬,从而“激活人的主体,通过审美启蒙,超越蒙昧,获得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进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和新的美学价值与意义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徐妍(中国海洋大学)则对学界单一强调鲁迅峻急美感加以反驳,认为鲁迅小说美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其悲凉的总体美感而开启了现代主义的峻急之美,同时呈现了古典主义的舒缓之美,还探索了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之美”,并具体分析了其“峻急美感”与“舒缓美感”。前者以“峻急的叙事节奏”、“心理辩难叙事”和作为“隐喻的存在”的“人物”为特征,既“承担了‘立人’的启蒙思想之重”,同时又构成了启蒙与文学内在紧张的悖论性特征。后者以“童年和成人的双重叙述视角,追忆、故乡的核心词,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写,诗化表现手法”,生成一种自在之境的古典美,即“与现代主义峻急美感并置的古典主义舒缓美感,并由此居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古典形态写作的中心”。“正是这两种不同美感形态的融合,构成了鲁迅作品独有的悲凉美感”,并且通过不断探索,“呈现了现代主义美学的局限以并传达出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似断实连’,进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中心”。

二、鲁迅文学经典重读

文学经典往往具有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鲁迅的文学作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解读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息,可以给各种文学理论与范式提供文学的支持,正说明了它丰厚的文学蕴含。李冬木(日本佛教大学)详细考证了日本明治时期以来“吃人”言说的形成与演变,正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文明)观念形成

的过程,进而透过鲁迅与这些“吃人”话语的深切关联,提出“《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一意象,是在日本明治时代相关讨论的‘知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明治时代关于‘吃人’的言说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母题’”。这不仅提供了鲁迅《狂人日记》新的文化渊源,丰富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历史背景,而且提供了“‘周树人’成长为‘鲁迅’的路径”,“可视为‘近代’在‘鲁迅’这一个体身上发生重构的例证”。张直心(杭州师范大学)同样将《狂人日记》“置于一种更其繁复深广的思想史脉络中,重估其意义”。虽然其“狂人”有“人神”和“超人”(神人)的不同,但是都构成对“末人”的对立与超越;如果说托氏的《狂人日记》是“自忏之书”,那么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是“勇于忏悔而一雪民族耻辱”的大爱之作;而托氏与鲁迅反传统的“疯狂”同样源于其“激进的人道主义”,并彰显了作为民族心魂的根本精神——从而在凸显鲁迅与托氏的精神关联的同时,也深化了对他们的认识与理解。王学谦(吉林大学)继续他关于《狂人日记》与鲁迅生命结构的思考,从生命悲剧的角度对《呐喊》、《彷徨》中人物的生命状态加以扫描。不过,虽然在与社会总体性的冲突中凸显了这些人物的生命意志,但是与此同时是否也遮蔽了这些人物更深广的社会文化(启蒙)情怀呢?比如魏连父的“突变”是否仅仅在于经济危机?是否与文章谈到的他关于“孩子”观念的变化也有关联呢?^①

同样,对于鲁迅小说“‘技术’含量和‘小说化’程度最高的”《伤逝》的解读也始终充满了争论。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梳理了作家的创作脉络与追索了研究视角的变迁之后,透过元叙述者的“沉默和在沉默中不动声色的个人化命名”——“涓生”名字的解析,否认它是一篇“爱情”小说,而是展示知识(思想)在缝合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传奇。“‘涓生’和‘子君’彼此给对方造成的好感、发散的魅力,都连结在与师生关系类似的知性和理性授受的轴线上”,“真正为持久稳固的爱情所必需的那种富有包容力和化解力的深沉情感,却恰在这里告缺”。因而他们的悲剧又被转绎成了“一个资源有限的知识和思想的运演困局”。曹清华(深圳大学)则透过作为阿Q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分析,揭示出阿Q、祥林嫂、孔乙己、爱姑等形象表达权力的被扼杀,正是鲁迅透视其笔下人物的一条重要线索。彭明伟(台湾交通大学)透过《明天》和《祝福》的解读,特别是单四嫂子的“梦”与祥林嫂的“疤”,发掘出鲁迅如何品味她们的悲哀,并在看似冷静而客观的叙事中呈现出她们希望与绝望抑扬交织而悲哀也就逐渐累积而深化的“悲哀的推移”的原则。这种“细腻而深入地直写小人物不为人知的悲哀”的方法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文学之所以动人的一个源泉。余连祥(湖州师范学院)则通过对鲁迅的“乡土小说”的细读,勾勒出包含着小城、市镇和乡村不同场域的鲁迅的小城镇叙事,

^① 其实狂人之“狂”并不仅仅在于他发现了“吃人”的真相,更主要的在于他要“劝转”人们去了“吃人”的心思,因而他最后留下的声嘶力竭的呼唤是“救救孩子”。

更新了鲁迅“乡土小说”研究的视野。

《出关》是一篇鲁迅专门为它写过辩解和解说的小说,其起因便是作家感到了读者的误解。这正标志着它的费解,这种费解一直延续到今天。邓国伟(中山大学)结合鲁迅的《〈出关〉的“关”》认为,鲁迅并不是否定老子全人,而是借“滑稽化了的老子来和‘现代人’开一个玩笑”,因而在情节上留下了某些破绽,由孔老相争而写出老子不得不“走流沙”(退隐),接下来却讥嘲他的学说“大而无当”,而在讥嘲老子的同时,“相关的人物也漫画化了”。“在这样的语境中,作者到底是讽刺老子,还是讽刺了‘签字手’一类的庸众呢?是‘哲人’与‘庸众’的对立,还是‘空谈家’与‘实际者’的对立呢?”不过这类小说其实是鲁迅与文坛同辈人的对话的一种方式,是对这些“新时代的‘战士’们”以老庄的旗号(沉静)独善其身、而失却进取意志的一种告诫,并且是通过对自己的深刻的反思得到的,这正是鲁迅的深刻和特别之处。张钊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透过鲁迅与左联前后的背景关联,解读出《出关》的现实寓意:这是鲁迅对后期左联(周扬等)的文学回应,而老子只是借来的“面具”。扩而大之,《故事新编》也是一个难以解读的“异数”。徐钺(北京大学)对之做了一个结构性读解——“在取用‘历史演义’的叙事形式对古事进行‘现代化’诠释的八篇《故事新编》中,不仅有着小说结构形式上重要的先锋探索意义,也不仅具有文本或文本层面之上的、主体对于外在(包括对历史、对国民性、对儒道墨诸家思想等等)范畴的思考诠释……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还在于文本背后:作者在其‘价值新诠’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自我价值体系梳理,以及从中可以洞见到的、动荡中的晚年之‘鲁迅哲学’”。那种“价值呈现与质疑的自反结构”是最契合鲁迅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并敞开了作家晚期思想“多解”的可能性。

在鲁迅的文类中,杂文是一个引起更大争论的文类。朱寿桐(澳门大学)继续批评本体说^①,认为既有的批评在(“创作”)文艺性上论证鲁迅的杂文是偏离了它的本体,而应该回归批评本体,才能真正确证它的价值。当然“批评本体并非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术语文学研究范畴,倒可以归入文学的学术本体”,而是一种与“情感文类”、“经验文类”并列的“思想文类”。在朱寿桐的研究中,无疑潜隐着对既有的文学理论是否契合杂文特质的质疑。这种质疑在汪卫东(苏州大学)的文章中则进一步发展发展为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性”的反思。在他看来,鲁迅的杂文是源于鲁迅“文学主义”的一种选择,这种“文学主义”的核心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终极性的精神立场”和“独立的行动”。“杂文写作,是于转型时代让每个有意义当下成为现代史的行动。鲁迅以杂文为武器,最充分地发挥了文学参与历史和干预现实的功能,展现了其个人存在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复杂纠缠”;同时也“冲击并改变着固有的文学规则和秩序”,“带来和确立了新的文学性质素,丰富并深刻影

①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本体形态》,《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

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性建构”,它“使沉溺于传统惯性的存在变为陌生,同时展开现代生存的新的可能性”。的确,如果进一步延伸,我们可以追问,那种追问杂文是否具有文学性的“(纯)文学性”是否真的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性?自觉地站在一种“反权力性(包括所谓的‘纯艺术’和由西方‘文学概论’规范的‘制度化的文学’)”的立场上写作正构成了鲁迅杂文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这正是自由地表达“为现在抗争”的时代需要。而正是在这种表达中建构起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杂文及其文学性。回应前面孙郁所说的不要简单用西洋理论附会鲁迅的美学观,这一命题应该扩展到鲁迅研究的方方面面,如何回到鲁迅自身,回到中国历史的实际,寻找出中国自身的问题与经验,应当是推进鲁迅研究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种文学经典,除了社会现实功能外,也应该有超越性的文学价值。代田智明(日本东京大学)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意义把鲁迅文学认定为“治愈文学”——“对陷于受挫而失意的人常常会给予很大程度的治愈和鼓励”,“在人的内心世界矛盾地共存着两个视线:一个是对现实受不了的视线,另一个是即使如此也受得了的接受视线。这样才开始形成能对现实起作用的主体性。治愈过程是形成这种主体性的重要因素”。《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就是或通过“把自我对象化的视线”,或“靠母性视线与父性的监视这样双方的视线,而不断反复地得以形成”。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则通过“鲁迅常用的纪念文字是‘记念’,而非约定俗成的‘纪念’”现象的考察,发掘出鲁迅独特的修辞法——“现代汉语中普遍使用的‘纪念’,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仪式和制度安排;鲁迅所坚持使用的‘记念’,则更倾向于一种个人情感和内心记忆”,因而“在表达内心深处的个人记忆时,鲁迅倾向用自己所喜欢的‘记念’,在代表社会角色做集体发言时,鲁迅一般用‘约定俗成’的‘纪念’”,并由此形成了“回忆记”和“纪念文”的区别。“回忆记”是鲁迅文学中最感人、最抒情的篇章。郑家建(福建师范大学)则以“被唤醒的灵魂”(人物)、“镌刻的时光”(事件)、“‘现在’与‘过去’的交错”(叙述)和“黑暗之舞”(构思的奇妙、叙述的奇崛和想象的奇幻)为题细腻而别致地分析了《朝花夕拾》“记忆”的叙述美学。

三、鲁迅的世界影响及其他

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开始就对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王家平(首都师范大学)以翔实的资料对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的影响与传播的区域格局与重要学派作了梳理与勾勒。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美学、艺术与“文化研究”,还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革命)政治研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远东国家的精神研究,都表明鲁迅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由“竹内鲁迅”所标志的如此深入地介入到(东亚)民族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层面,并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正说明鲁迅已成为东方现代性的一个不竭的源泉。赵京华(中国社科院)更加细致地梳理了“活在日本的鲁迅”。虽然日本与中国存在着历史时空的错位,但或许正是这种错

位使日本的鲁迅研究“构筑起特有的鲁迅想象,并使鲁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得另一种特殊价值”,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渐渐失落的鲁迅精神的某个侧面,却在异域的战后日本得以显扬。那个充满‘赎罪的心情’而执著抵抗的战士鲁迅、那个片刻不曾离开中国政治的革命人鲁迅、那个穿越对死亡的深度思考而获得新生的哲学者鲁迅、那个象征着新亚洲个人主体性原型的鲁迅,还有以‘向下超越’的方式在土俗民间世界获得反现代立场的现代主义者鲁迅,以及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所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之批判而达到后现代境界的鲁迅形象……”。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今天需要“将鲁迅再‘政治化’”,即“站在今天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认识基础上,再次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放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发现他与那段历史的血肉联系,从中寻找鲁迅对当今的启示”。

藤井省三(日本东京大学)通过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小说《1Q84》发掘出“《阿Q正传》的亡灵们”。在他看来,村上春树是一个自觉传承鲁迅文学精神的作家,从《没落王国》(1982年)将主人公命名为“Q氏”开始,此后就不停地描写“‘Q氏’的兄弟们”。在《1Q84》中,深绘里的小说《空气蛹》是贯穿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引导深绘里的深绘里之父的原型新岛则撰写了《阿Q的乌托邦》,他关于《狂人日记》《阿Q正传》“月光”的分析与“村上‘1Q84年’的天空时常浮现着两个月亮结合起来考虑,是意味深长的”。“我呢,只是喜欢你的灯泡脑袋”——则仿佛是“百年前在中国的未庄遭受阿Q性骚扰的小尼姑和吴妈化为亡灵,逃出寺院或者赵地主家的大院,凭依在百年后出现于东京的青豆身上发出的咒语”。“没有通常的名字,被家族驱逐,集固有共同体人们的劣根性于一身,使读者失笑、苦笑之后成为牺牲品死去,立体展示旧共同体的伦理缺陷,引导读者进行深刻反省”的牛河则可以说是“阿Q的再现”。正是从“‘阿Q’形象系谱”的源远流长,可以洞悉鲁迅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深远。董炳月(中国社科院)则聚焦日本剧作家霜川远志通过改编《阿Q正传》、创作《戏剧·鲁迅传》而呈现的一个“另类的‘鲁迅’”,这一“霜川鲁迅”虽然被投注了更多的作家自我想象,但是“却通过近于荒诞的虚构接近了鲁迅内部空间中某些更为本质的、灰色地带的真实”,代表了“日本民间鲁迅”的某一面向。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分六个阶段比较细致地梳理与介绍了近百年鲁迅在韩国接受与影响的脉络。“1920年最初简单介绍到韩国来的‘鲁迅’,经过几个曲折艰难的阶段,到了现在,鲁迅在韩国已经普通名词化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韩国鲁迅’、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李泳禧的实践性介绍,鲁迅成为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喜欢阅读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的思想导师之一”。北塔(中国现代文学馆)则细致地梳理与探讨了鲁迅诗歌英语翻译成果及其问题。

除了以上专题外,会议还就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当前的鲁迅研究等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杨义(中国社科院)的《鲁迅与先秦诸子》认为,“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的情结,必

须从鲁迅的诸子观入手”，“鲁迅的诸子观，乃是一种独特的扶心自食的文化观”，并且是“复合型的”，呈现出四个维度：一是启蒙思想家的方式，以《摩罗诗力说》为嚆矢；二是文化史和文化研究者的方式，以《汉文学史纲要》为标志；三是小说家的方式，以《故事新编》为形态；四是杂感批评家的方式，以一系列杂文中零碎却犀利的杂感为形态。相互参照总体综合，“与‘铁屋子’的社会文化体验、‘肩着黑暗的闸门’的文化担当一道，形成一组相互关联的意识流，深刻地彰显了鲁迅的文化精神本质”。陈国恩(武汉大学)认为“在消费主导型的社会环境中，鲁迅遭遇了寂寞”，但是在回归鲁迅、回归学术、回归研究者自我的过程中也可以在“坚守中找到鲁迅研究的新方向”。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具体分析了“娱乐化时代对鲁迅戏说与恶搞”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于‘工具化鲁迅’的逆反”，二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三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戏说”与“恶搞”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与道德底线是：“对于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同时，戏说、恶搞应该有一个限度。陆建德(中国社科院)则从鲁迅翻译“象征写实底童话诗”《小约翰》入手，试图阐明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与“正人君子”和“学者”激烈交战、坚持与一切恶势力决绝反抗和斗争的鲁迅内心，也似乎还有谋求温和与宽容的另一面。他巧妙拈出这个话题，意在强调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鲁迅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志的同时，也需要建设性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鲁迅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先在地决定了鲁迅研究必然地会成为永恒的课题”。“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就在于他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等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他的目光所及几乎渗透到了一切精神文化领域”，因此，“从不同的方面，都可以揭示出相关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决定了对其研究的视角不可能是单一的。各种视角之间可以互补，从各个不同角度揭示的意义都可以共同地合理地被人们所接纳。只有通过鲁迅这个研究对象的多角度的观照，才能够勾画出充满了丰富性的鲁迅的整体的和立体的面貌”。当然鲁迅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不断地得到增值，“而鲁迅意义的永恒，恰恰在于他可以不断被阐释，并在不断的阐释中被增值”。同时“鲁迅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的种种文化命题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而应该重提“鲁迅研究的当代性”。“当代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种种淡漠和隔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研究中只注重所谓纯学科价值，而忽略对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和对其现实意义、价值的揭示所带来的后果”。而“鲁迅文化遗产价值的长久性正是体现在研究的当代性之中”，“学者们书斋研究的成果可以，也应该转化为推动现实的民族文化‘重造’的重要资源”。“鲁迅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的价值意义层次可以适应不同的接受对象”。鲁迅研究应该“为不同层次需求的人们提供鲁迅文化遗产的不同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阐释。唯其如此，才能使鲁迅真正成为与中国的现实人生普遍相干的鲁迅”。

>>> 目 录 <<<

鲁迅研究的世纪反思与突破——“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代序）

..... 王晓初 赵京华 001

鲁迅与现代中国

鲁迅：20 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 彭定安 003

鲁迅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与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 张梦阳 030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王吉鹏 046

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 [港] 林曼叔 050

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关于“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思考笔记 张 克 060

鲁迅经典与 21 世纪中国现代公民成长 叶继奋 072

走向左翼文学（文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的重组与分化

——鲁迅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化选择 王晓初 082

痛感：鲁迅现代体验的起点——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之一 李 怡 101

“我要骗人”：鲁迅言与行的背离——兼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的当代意义

..... 袁盛勇 112

鲁迅与胡愈之——鲁迅为何拒绝赴前苏联疗养..... [日] 长堀佑造 124

鲁迅：对生存隐秘的凝视 孙 郁 137

鲁迅美学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黄 健 147

“启蒙”如何内在化于“美感”——从一个视角看鲁迅为何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经典的中心

..... 徐 妍 156

鲁迅文学经典重读

明治时代的“吃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日] 李冬木 171

《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 张直心 195

存在的焦虑与危机——《狂人日记》与鲁迅文学的生命结构之四 王学谦 203

《伤逝》叙事建构与主题蕴含再认识	李林荣 215
表达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曹清华 229
悲哀的推移——谈鲁迅小说叙事的特点	[台]彭明伟 236
鲁迅小说的小城镇叙事	余连祥 253
关于《出关》和《〈出关〉的“关”》	邓国伟 264
重读《出关》的现实寓意	[新]张钊贻 272
新编与新诠——对《故事新编》的结构性读解	徐 钺 283
鲁迅杂文与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性”	汪卫东 318
论鲁迅写作的批评本体意义	[澳门]朱寿桐 339
“记念”的修辞术——鲁迅的纪念文字与文章辨读	符杰祥 348
说吧,记忆——《朝花夕拾》“回忆”的叙述学分析	郑家健 赖建玲 361
作为治愈文学家的鲁迅	[日]代田智明 377

鲁迅的世界影响及其他

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区域格局及其重要学派	王家平 385
活在日本的鲁迅	赵京华 395
村上春树《1Q84》中《阿 Q 正传》的亡灵们	[日]藤井省三 402
“日本鲁迅”的另一面相——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及其周边	董炳月 411
鲁迅、丰子恺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日]杨晓文 432
“送去主义”与“书法外交”——以鲁迅与日本为例	李继凯 445
鲁迅在韩国:接受脉络与社会影响	[韩]朴宰雨 455
述论鲁迅诗歌的英文翻译	北 塔 469
鲁迅与先秦诸子	杨 义 485
寂寞中的守望——消费时代的鲁迅和鲁迅研究	陈国恩 513
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	杨剑龙 520
我们如何深化和发展鲁迅研究	
——在纪念鲁迅一百三十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朱晓进 529

∨
∨
∨

鲁迅与现代中国

^
^
^

鲁迅:20 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

辽宁社会科学院 彭定安

鲁迅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经典,可谓已成定论。一方面,不仅是肯定鲁迅方面的论者如此认定——这一点,拥有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的、从国内到国外包括日本以及欧美的数量非常可观的鲁迅学论著为充分的证明。另一方面,即使是站在否定鲁迅包括完全彻底否弃鲁迅的论者们,也是如此。表面上,他们虽然使用各种方式和语言来谩骂、攻击、否弃鲁迅,不要说承认鲁迅作品的经典性,就是对于它的当时的“现时价值”和当今的存在意义,也都是基本否定甚至嗤之以鼻的。但是,在客观上,在实质上,他们却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地、前赴后继地,把鲁迅当作一个靶子来打。而且,总是在他们试图树起一面什么旗帜,或是提出某种文学理论或主张,或者是要树立自己或同伙的时候,就想起了鲁迅,用以祭旗或扫除障碍或搬走绊脚石。这就证明,他们私心里是不得不承认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一个文学的丰碑和旗帜,不除去、不搬开、不砍倒,就不能照己意行动。这是一种从反面的肯定,在否弃中的承认。他们先是感受到鲁迅的威胁、鲁迅作品的经典性,而后再否定、抛弃这种经典性。

其实,讨论鲁迅的经典性这一点,并不那么十分重要。承认其经典性者,无须耳提面命地告知;而一心否弃者,再充分切实的论证,对他们来说,也是虚无。重要的是:探讨和论证鲁迅的经典性的核心内涵、文化基因是什么?它产生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何在?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其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是什么?

一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理论思维;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则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气候”;荣格提出过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论旨;梁启超也论述过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潮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些历史哲学和文化命题,共同指向一个论证母题:每个时代都有困惑、诱发、刺激、启迪、激起某个民族的全民族性的整体思维和基本感情、主要追求和理想的“集中—集体—无意识”的生活和生命诉求。它们有如幽灵,有如魂魄,有如神祇,游荡于社会生活中,飘浮于民族上空,启示人们感受到忧伤、悲哀、痛